

国有企业是国家经济安全的中流砥柱

■ 江涌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个在全球化下不断推进改革开放的大国,中国的国有企业肩负着艰巨的历史使命与现实重任,是其他任何一类企业制度形式所不能替代的。

在世界范围内,国有企业在理论上不仅易于达成“社会责任和义务以及公共政策目标”,而且在国家利益拓展、经济基础夯实、社会与经济安危中,扮演不可替代的关键角色,是国家经济安全的中流砥柱。

国企能够约束资本的贪婪

人世间,最贪婪的莫过于资本。资本一方面可以焕发巨大的物质财富生产力,另一方面则不折不扣地产生无穷的破坏力,将自然环境、道德良知、社会秩序等一切积极社会要素,无一例外地拖进了市场这个“撒旦的磨坊”,碾个粉碎,社会的无穷灾难便由此开始。

政府的权力、大众的民力与企业的钱力或资本构成现代国家的三大基本力量,实践表明,若“权力—钱力—民力”三大力量保持相对均衡态势,社会则能保持相对稳定和谐。

节制资本,即用政治力量、社会力量来约束不断扩张与日益嚣张的资本,在经济自由主义复辟之前,早已成为社会的共识。

节制资本,就是给资本戴枷,让资本的血管流淌道德的血液。首先要用国家的权力来制约资本,改造资本,为资本建章立制,确立活动框架,这就是资本国有化。其次要把社会的民力引进企业中,来控制资本,这就是资本社会化。以国有化或社会化节制资本,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探讨了很多种方式,最终证明,国有企业是最有效的方式。我们知道“鞍钢宪法”与“两参一改三结合”,这种资本国有化、社会化是非常有效的,对资本进行有效的约束,使个人的利益、企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同时都能得到兼顾的一个很好的现代企业经营机制和组织形式,这就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兼有部分政府与社会职能,是实现“权力—钱力—民力”和谐的最积极尝试。

国企能约束资本扩张的负面因素

贪婪的资本与生俱来便遭遇“利润率平均化”与“边际报酬递减”的魔咒。为克服这两大魔咒,资本在技术结构上不断信息息,在形态上不断虚拟化、金融化,在空间上不断全球化、国际化。

资本由工业资本到商业资本,再到金融资本,形态越来越虚拟,相应的国民经济也越来越虚拟化、泡沫化。资本在虚拟化、泡沫化过程中,不断稀释真实财富,最后达到转移财富的目的。这是当代资本金融化、热钱化,以实现赚大钱、赚快钱的主要途径。经济全球化本质上就是资本于国际、全球扩张,除了要摆脱“利润率平均化”以及“边际报酬递减”的魔咒、获取垄断利润外,另一个重要动机就是要摆脱工会力量(民力的一种体现)与“政治工资”(权力的一种体现)的约束。资本的横向全球化与纵向虚拟化并行不悖,因为现代大型企业集团都有自己的投资机构,宜工则工,宜商则商,能乘机捞一把就不会放过任何投机机会。

资本的虚拟化与全球化,在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不仅给东道国政府与大众带来压力,而且也给本国政府与大众带来挑战。跨国企业从全球化中获得巨大收益,其利润如滔滔江水,源源不绝。但是,企业利润的增加并未导致母国国库收入的增加,至少是没有同等幅度的增加,因为跨国企业可以在税率极低的甲地注册,用乙地资源,到丙地生产,于丁地销售。即企业可以利用国际分工,利用转移定价等手段,轻松逃避缴税。而为吸引企业留在国内,保住国内就业,政府在企业间的压力与游说下则不断调降企业税负,如此进一步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入。

另一方面,政府应对全球化、金融化消极影响的开支不断增加。企业跨国生产、转移服务,导致母国失业增加,从而使政府的福利性支出不断增加。与此同时,掏空产业,卷走就业,输出资本与利润,留下程度不等的烂摊子,最终都要由政府收拾。一些大企业、大机构因金融投机不慎而深陷债务,在“太大而不能倒”的思想胁迫下,政府还不得不伸出援手,如此将私人机构债务国家化。这样,政府的包袱越来越重,踟蹰前行。



王利博制图

很显然,全球化使资本尤其是跨国资本成了最大赢家,而国家、发展中国只能以国家垄断来对付跨国垄断,这个国家垄断就是通过国有企业来实现。透视日趋开放的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大凡有国有企业存在的行业与领域,其相对应的国家经济安全都有不同程度的保障,很显然,国有企业的实力、竞争力与国家经济安全的保障度成正比。

实践也证明,只有国家垄断才能对付跨国垄断。新兴市场在全球化下的国际分工中能够占有一席之地,如今,一些新兴大国甚至能够实现群体性崛起,就是因为在这些新兴大国当中,有一批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利用各种相对优势,在某一行业、某一地域,以垄断对抗垄断,即以国家垄断抵御跨国垄断,以“地头蛇”的方式来对抗“强龙”,从而为自己赢得了生机和活力。与此同时,这些国有企业与跨国企业正面临竞争,本国的私营企业在后方、在狭缝中赢得生存与发展机会,如此也一定程度地保护了本国弱小的私营经济。而且在关键的时刻,在西方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新兴国家的国有企业还可以反戈一击,在国际分工中为自己争得更多的利益。

国有企业可以有效抗衡跨国资本的垄断与扩张

当今国际市场,于各行各业横刀立马的尽是跨国垄断公司,如波音与空客两巨头垄断大型民用飞机制造、ABCD四大粮商垄断国际粮食贸易。在当今世界,如果你把国家和企业作为一个经济体放在一起进行匡算的话,在前100个经济体当中,大型企业的数目超过国家,诸多跨国公司都有相当于波兰这样一个中等国家的经济规模。

跨国公司富可敌国,强可灭国,是一个个强大的“公司帝国”。凡是世界所有的能够给它带来利润的地方,它都能渗透进去;凡是所有能够阻止他获取利润的东西,它都要把它摧毁掉。全球化条件下跨国资本的扩张和渗透基本是无止境的。所以,如何抵抗这些富可敌国、强可灭国的跨国公司的扩张,很严峻地摆在世界那些后进国家的面前。在后进国家当中,通常都是些弱小的民营企业,这些民营企业几乎都是以原子化和碎片化的形态呈现在跨国公司面前,这样如何能抗衡跨国公司的扩张,如何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当然,也有一些民族企业家、政治家振臂一呼试图把民营企业组织起来,来抗衡跨国公司,这无异于以卵击石,这是把小舢板拼组起来,自以为这就是“航空母舰”,然后跟真正的航空母舰抗衡,这是非常不现实的。环视全球,市场不断开放下的后进国家民族企业多半成为跨国公司的附庸,获取低廉利润,难以做到资金、技术、人才的积累而实现自主创新,由此很难成长为可与跨国公司匹敌的巨型企业。在跨国企业遭遇困境时,往往成为风险转移与危机转嫁的对象,多半长期为基本生

存而不断挣扎。

现实的选择是,后进国家、发展中国家只能以国家垄断来对付跨国垄断,这个国家垄断就是通过国有企业来实现。透视日趋开放的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大凡有国有企业存在的行业与领域,其相对应的国家经济安全都有不同程度的保障,很显然,国有企业的实力、竞争力与国家经济安全的保障度成正比。

实践也证明,只有国家垄断才能对付跨国垄断。新兴市场在全球化下的国际分工中能够占有一席之地,如今,一些新兴大国甚至能够实现群体性崛起,就是因为在这些新兴大国当中,有一批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利用各种相对优势,在某一行业、某一地域,以垄断对抗垄断,即以国家垄断抵御跨国垄断,以“地头蛇”的方式来对抗“强龙”,从而为自己赢得了生机和活力。与此同时,这些国有企业与跨国企业正面临竞争,本国的私营企业在后方、在狭缝中赢得生存与发展机会,如此也一定程度地保护了本国弱小的私营经济。而且在关键的时刻,在西方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新兴国家的国有企业还可以反戈一击,在国际分工中为自己争得更多的利益。

国有企业是国家经济危难时的最可靠依托

国有企业是跨国资本的死敌,因此,消除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是跨国垄断资本处心积虑的目标。在强化市场竞争的同时,跨国垄断资本则另辟蹊径,从东道国内部的政策与法律入手,从相关代理人与利益集团入手,想方设法诋毁国有企业,直至消除国有企业。跨国垄断资本通过各种途径向发展中国家大肆兜售新自由主义,其基本要义就是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以扫清垄断资本扩张的障碍。

跨国资本要在全球顺利实现扩张,就必须消除东道国的国有企业,然后把跨国资本的垄断根植在被征服的新兴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公司帝国。从一些拉美国家、非洲国家,还有南部的部分国家的结果来看,凡是自由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后来都成了跨国垄断资本的乐园。因为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都是一个概念,其结果都指向国际化,悉数进入跨国垄断资本的棋局,成为跨国公司的盘中餐。

比如,在拉美的阿根廷,由于新自由主义的严重渗透,政府把所有的国有企业都私有化了、市场化了。国有企业私有化、市场化,都要经过股份制改造,其结果要么进入股票市场流通,要么被私人股本公司整合,最后这些企业股份都流转到了跨国资本的手里,主要流到了美国跨国公司的手里。如此,阿根廷的经济命脉基本掌握在国际垄断资本的手里。国际资本为了获取垄断收益,不断在阿根廷兴风作浪,直接导致阿根廷发生金融危机。而当阿根廷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达国家请求资金援助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达国家银行要求阿根廷用相关资产抵押。但是,阿根廷早已把国有企业卖掉,贷款请求被无情拒绝。所以危机发生后,阿根廷的民众、政府只有忍受危机的煎熬。

相反,墨西哥政府在市场自由化的时候留了一手,包括石油、铁

路、电信等企业仍控制在国家手里,当然电信后来也被私有化了。当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政府用这些国有企业做抵押,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发达国家的及时贷款,墨西哥政府用这些贷款平息了危机。在俄罗斯,普京执掌克里姆林官柄后,对叶利钦时期的自由经济政策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全力收复石油、天然气等战略资源行业,重组国有企业,保证国家对经济命脉的控制,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生活与国际地位因此有了明显改观。

国有企业是国家经济安全的中流砥柱

按照毛泽东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来看,民族资产阶级有其典型的两面性:依附跨国垄断资本,成为其国际分工链的一环,决定其软弱性;受跨国垄断资本的欺压与剥削,决定其斗争性。民营企业在生产上有一积极的一面,可以促进国家经济的繁荣,在生产关系上又体现出妥协和软弱的一面,他们只会“傍大款”,当国有企业处于主导地位的时候,他们是国有经济的补充;到了跨国资本居于垄断地位的时候,他们则是跨国资本的附庸。

中国有很多民营企业,多年来通过各种渠道与途径向国家要政策,向国有企业要地盘,国家给了政策,国有企业让了空间,它们由此也发展起来了,长势良好。但是,当跨国垄断资本以极高的溢价实行收购时,它们就缴械了,成为跨国资本进军中国的铺路石。这种情形很多,中国物流业的“集体沦陷”就提供了很好的案例。

我们可以依靠民营企业来实现社会经济的繁荣,但是繁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追求的目标是繁荣过后还要富强。要富更要强,富不强是危险的。纵观世界,有很多国家尽管很富,但是不强,最后这些国家都陷入资源的魔咒,都陷入动荡的深渊,因为它们没有能力来保护自己的财富,使自己的国家陷入战乱动荡的局面。

如果说,民营企业在经济效益增进上职能显著,在社会效益增进上有待进步,但是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上,则不能也无法寄托期望。道理简单,那就是不可以期待“跪着造反”来实现革命,自然也不可期待,作为跨国垄断资本的附庸,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当我们倡导“发展是硬道理”的时候,中国可以依靠私营企业、民营经济来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但是,当我们突出建立富强国家、看护好创造出的财富、强调“安全也是硬道理”的时候,就不能过多指望民营企业来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多家媒体披露,我们很多民营企业企业家都准备了好多本护照,相关报道显示,快富暴富的房地产商有七八成随时做好登岸弃船的准备。因此,指望这些企业、这些人来维护我们的经济安全,太不靠谱了。我们也不应该指望让民营企业与企业家维护我们的安全,他们为我们创造繁荣、创造财富已经是了不起的事了,那么谁来维护我们的经济安全,帮我们看护好我们创造的财富呢?作者认为,唯有国有企业。

(来源:《国有资产管理》,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旭红观察

国企竞争力与垄断质疑



讨论垄断的问题,实际上它跟政治、经济社会密切相关,也由此导致了市场出现很多偏激和极端的舆论现象。

在整个市场经济体系中,国企的挣钱能力经常受到质疑,招来一浪高过一浪的批评,以至被简单地认为,国企钱赚得比谁都多,凭借的不是自己的竞争力而是垄断地位。将“垄断”帽子扣到国有企业头上,实质是宣泄一种情绪。国企的形象也一改过去的“老朽无能”,变成了现在的“蛮霸强横”。

无独有偶,早些时候,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曾提及“竞争中立”的概念,他指出,中国国有企业借力政策支持,实现了规模经济,降低了运行成本,提高了销售和新技术的能力,进而提升了总体竞争力。

从战略上看,美国正在积极拼凑国际联盟,为其通过多边途径“修理”中国提供舆论和法理支撑。“竞争中立”论旨在推动修改国际经贸合作规则,以期削弱中国不断增长的对外贸易和投资领域的比较优势,抬升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的门槛。

那么,事实到底是什么?国企的崛起缘何引起如此高度关注?国企的竞争力难道真的如民众所讲都来自于垄断?国企的竞争力究竟来源于哪里呢?

近些年来,国有企业改革不断地深化,通过实行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国有企业逐步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并随着市场的日渐成熟,国企的竞争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数据显示,央企的营业收入从2002年的3.3万亿元增至2011年的20.2万亿元,增长6倍多。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年下降,但国有企业实现利润总额由2002年的2636亿元增长至2011年的14989亿元。

J-20隐形战机正是国企的杰作,技术具全球一流甚至领先水平;中国高铁技术已在世界上独占鳌头;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正在自主设计、制造、安装世界最大的8万吨级大型模锻压机,将为中国发展大飞机等项目提供坚实基础;世界上运行电压最高、输电能力最强、技术最先进的交流输电工程也在中国诞生。

济南二机床集团战胜了德国、日本等国际机床巨头,获得了福特公司在美国两个工厂全部五条大型快速智能冲压生产线订货合同。

一批国企不仅在国内市场占据一席之地,而且在海外市场也正正在开拓出一片新天地,在与国外企业的较量中,靠的就是自身日益强大的竞争力。众多的国有企业一马当先,在全球各地架桥铺路,盖高楼建厂房,筑水坝修管线,包括中国建筑、中国交通建设集团、中铁建公司等。

明眼人一看便知,100多家央企在内的多数国企并非是非垄断企业,所谓的垄断企业只占少数。118户中央企业中,除2家电网企业、3家电信企业、3家石油石化企业、10家军工企业、2家粮棉糖储备企业和1家盐业企业共21家企业外,其他企业都处于竞争性领域。

总体上,中央企业以市场为导向,立足于做强做大主业,一方面推进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另一方面调整内部组织结构,从而优化了资源配置,增强了整体实力,使企业发展呈现新的活力。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市场规则,国有企业实施了重组剥离,减少了政府的“拉郎配”,从而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充分发挥了市场力量,使其竞争力最大化,并紧紧围绕核心竞争力,打造出核心业务。

特别是国资委成立以来,对一些中央企业进行了多次重组,央企户数从196家减少到117家。为了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一批科研院所进入产业集团,实现了产研结合;为了增强海外市场的开拓能力和竞争能力,一部分“窗口”公司并入大型骨干企业;为了具备较强综合竞争力,一些优势企业强强联合。

近年来,通过重组,国有企业在一般竞争性的行业中所占比重趋于下降,但是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企业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不断提升,占据主导地位。

目前,在国有企业比较集中的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建材、建筑、机械制造等行业,已经形成充分竞争格局。如电信产业形成了3家拥有全国性网络资源、实力与规模相对接近、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市场竞争主体,其目的就在于形成适度、健康的市场竞争格局。电信增值服务业务已经处于充分竞争状态。

除了少数关系国家利益和安全的企业外,一批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革、整体上市、中外合资、兼并收购等多种途径进行规范改制,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

实践证明,国企通过引入外部董事,建立了董事会,加强了对公司治理结构的规范,形成了以董事会为核心,出资人、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符合市场规律,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企业竞争力。

当然,下一步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开放市场?借鉴已有的实践经验,国资在制度层面、规则层面和操作路径是否应进行更为深入的改革?

国资委副主任邵宁表示,国有大型企业改革的总体方向是公众化、市场化,就是通过资本市场将现有的大型国企改造为上市公司,使之成为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成为公众企业。目前117家中央企业中,有40多家实现了主营业务整体上市。

此外,现在国企在海外四面出击,从提升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的趋势角度,首先靠的是遵循市场规则,其次靠的是自己的技术优势和成本优势,当然还需进一步提高产业集中度,提高国有企业的规模和控制力,加快培育一批世界一流企业。

未来,国有企业改革的力度及重心仍需加强,按照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完全成为市场竞争、技术创新的主体,融入世界经济的主流浪潮中。